

孙亚强

千百年来,中国各民族形成的民间文学,形态复杂,种类繁多,丰富多样,却始终薪火相传,深深地熔铸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目前各卷所收录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文学的民间性、艺术性、文化性、学术性、史学性和濒危性,是中国民间文学之集大成。这些作品的出版与面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欢迎。有的作品成为学术研究的经典史料和佐证资料;有的作品作为原创素材被转化和应用在文艺创作、戏剧创作中;很多作品在大学也已传播;有的经选编走进中小学实践课等。大系出版工程成果不仅是文学作品的集大成,其价值更在于当代的应用与传播。

史诗,是一个族群的百科全书,更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象征与文明丰碑。在原始时期,沿着地球北部冰寒地带生活的诸民族,大部分都是操狩猎渔猎、畜牧兼有农耕等生产方式的族群。他们在大自然的严酷考验中与其对抗和斗争,逐渐形成了各民族的生产方式、语言方式、文化传统,也形成了对现实的表述和各自的诗性表达。如赫哲族“伊玛堪”中的《满都莫日根》,鄂伦春族“摩苏昆”中的《英雄格帕欠》等。他们在相似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数量庞大、丰富多样的史诗类作品,反映了这些民族各自的审美理想、生活实践、社会经验及民间智慧的艺术表达方式。鄂伦春族史诗“摩苏昆”就是其中古老的艺术语言活化石之一。

“摩苏昆”作为鄂伦春族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其作品内容承载了鄂伦春族的神话、传说、故事、俗语、谚语等,体现了鄂伦春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历史、习俗和文化传统等,承载着鄂伦春族的民俗历史。

鄂伦春族是有自己语言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大小兴安岭,是我国典型的渔猎民族。鄂伦春族原始采集的自然经济和原始部落的组织形式持续得相当长久。新中国成立以来,鄂伦春族仍然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大散居、小集聚的生存状态。因此,鄂伦春人热爱和敬畏大自然,他们对山林生活有着特殊的感受,正如鄂伦春人形容他们自己的那样:“歌把我接到人间,歌又把我送上圣天。”“兴安岭有多少棵树,就有多少支歌。”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诗性表达,创作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其中最具有古老史诗形态的“摩苏昆”,当首推为鄂伦春族民间文学艺术的瑰宝。

“摩苏昆”是鄂伦春语“说唱”之意,有着诗与歌结为一体的散文叙述形式。其表演形式以一人表演为主,没有乐器伴奏,说一段唱一段,说唱结合。作品有长篇、中篇、短篇(长篇中片段独立成章的故事)。其语言流畅、精练、朴实、幽默,在诗体韵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摩苏昆”内容多以“莫日根”的英雄故事和苦难身世为背景,代表性作品如史诗《英雄格帕欠》等。

尽管“摩苏昆”历史悠久,流传广泛,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才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这时“摩苏昆”才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正式被外界发现与认可,并用文字形式记录出版。1980年以后,黑龙江省鄂伦春族民间文学工作者、黑河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员孟淑珍发掘整理出多部(篇)曾流传于黑河爱辉区和逊克县,及伊春嘉荫县一带的“摩苏昆”,并首次发表于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编辑出版的《黑龙江民间文学》,填补了鄂伦春族说唱文学的空白。现在尚存的“摩苏昆”有《格尔帕欠莫日根》《波尔卡内莫日根》《阿尔塔内莫日根》《布格哈莫日根》《鹿的传说》《双鸟的传说》《阿尔旦滚滚蝶》《雅日里虎罕与额日勒黑汗》《娃尔都日堪和雅尔都日堪》《吴达内的故事》等数十部作品。

这些作品反映了在东北亚渔猎民族英雄史诗篇章里保存最多、最普遍的“莫日根”这一通古斯语系中残存的古老词汇,但它在现代民族语中已不复存在了。“莫日根”是饱含敬虔寓意的渔、猎能手的美称,日后转用于英雄史诗正面主人公的名号之上。随着“摩苏昆”的流传、继承和发展,历史传承中每个部落都有较出色的“摩苏昆”讲唱艺人,每个姓氏家族都有“摩苏昆”传承人。演唱“摩苏昆”的艺人有男有女,说唱时声情并茂,叙述、歌唱、表情、动作合一,缺一不可,声音亦随内容的需要和发展而变化。因此,“摩苏昆”的作品都富有浓重的感情色彩。

大系出版工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之一,鄂伦春族史诗“摩苏昆”卷入选其中,我们深感荣耀。同时,也感到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因此,我们在田野调查、资料收集、史诗编纂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的编纂工作,本卷编委会不断推进各项实践活动的开展与落实。编辑江波利用鄂伦春族史诗“摩苏昆”中的原素材创作的儿童剧《寻梦呼玛》荣获2022年度“金童奖”全国优秀儿童剧剧本奖;编辑张明明利用在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对外汉语系汉语教师讲台下“摩苏昆”中的故事介绍给国际友人;今年是鄂伦春族山下定居60周年,在各地的庆典活动中,利用“摩苏昆”中记录的不同原素材创作的“斗熊舞”、说唱故事“莫日根凯旋归来”、幽默短剧“智斗玛猴”“欢乐的篝火节”等等,搬上了艺术舞台。

我们始终怀着对本地区的民族、历史、民间文化艺术和老艺人们的高度尊重与敬畏,扎根民族传统文化沃土,以期务实编纂出更多民间文学优秀作品,从而让这份鄂伦春族的历史过往重现光彩。希望通过我们的编纂,让这份瑰丽的史料跨越时空,使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更加完善。

(作者系黑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三级研究馆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黑龙江卷·摩苏昆分卷》主编)

# 山东谚语的形成与传播

□张廷兴

的山东人,构建起独特的精神家园、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因此山东民间谚语中携带了大量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信息。山东民间文艺的地域性特征也很明显,胶东沿海渔家风情浓郁,鲁中平原以农耕文化为特色,潍坊风筝、杨家埠年画、高密剪纸、淄博陶瓷、博山琉璃、周村丝绸等,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泥土香;鲁西地区传统深厚,孔孟家乡、水浒传地、古运河畔,民间织锦、斗鸡斗羊、婚丧嫁娶等,闪烁着古代文明之光。山东腹地济南、青州、泰安、兖州一带,一向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民有常业,礼有常仪,时有常节,生活有常制,其民俗传承对周围地区有典型意义,可作为山东民俗的代表。曲阜、邹城为孔孟故里,孔府的家族亲族俗制、祖神祭祀、婚礼丧礼、年节习俗、衣食住行是大家望族习俗的典型;泰安有五岳之首的泰山,则是研究民间信仰的一座活的标本库。

## 山东谚语的载体与传播

山东先民创作和使用谚语的历史已经远不可考。到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地方的诸子著作中,引用和创作的谚语比比皆是,以至于南宋杨万里在《独醒杂志》中说:“古者有亡书,无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谚之言,晏子诵焉。”

由于山东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山东历来为农桑重地,耕作经验十分丰富,农谚自然也就很多。西汉末年,汜水(今山东曹县)人汜胜之总结上古到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科学知识,写成《汜胜之书》;南北朝时的东魏益都人贾思勰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的新发展,总结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前人的农业生产经验,写成《齐民要术》一书。元代东平(今山东东平)人王祯总结南北广大农民的生产经验,写成农学名著《农书》。在这些农学著作中,都引用了大量的山东地区的农谚。

明清小说、小戏俚曲等的传播,也将山东谚语带到了四面八方。人们在喜欢这些民间文艺作品的同时,也开始接触、接受里面的山东谚语。明清小说中几部主要的作品,如《水浒传》《金瓶梅》《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都是以山东作为故事主要发生地。这些作家作品取材于民众集体创作的民间文学,天然地大量运用了山东谚语,仅《金瓶梅》里就大约有三百多条,《醒世姻缘传》里大约有四百多条。山东地方戏曲有二十多个种类,20世纪80年代记录整理出来的有80多册约六百多个剧目,里面也包含了大量谚语,成为戏曲表演中最为鲜活生动的元素,往往发挥点睛之效。在民间文学与民俗志书、地方志书的辑录里也保留了大量谚语。

## 山东谚语的研究辑录与“谚语卷”编纂

山东人很早就重视对谚语这种体裁的研究。《东莱书传》说:“乃逸、纵逸自恣也,乃谚也;纵逸则所习者下,委巷谣谚,常语于口也。”点明了谚语的性质。《礼记》释为俗语也,《左传》释为俗言也。《汉书·艺文志》载孔子的话,说街谈巷语“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对于谚语分析最为透彻的,当属刘勰,《文心雕龙》其中《谐隐》《书记》篇对谚语有全面精到的论述。

清朝到民国时期,山东文人、学者对谚语的关注有加,辑录成集者有康熙年间曲阜人颜修来、孔尚任的《鲁谚》,嘉庆年间邹县人马星翼的《鲁谚》,道光年间历城人马国翰的《农谚》等。民国十五年(1926年),史襄哉编《中华谚海》,所用的山东谚语资料,为莱阳人程宪钊、程宪钢二人合编的《山东谚语》(一卷)。到20世纪30年代,山东民众教育馆编写专门用作教育读本《山东歌谣集》,收集了许多谚语。另外,一些地方志书的风俗篇和乡土录里,则收集了当地具有代表性的谚语,如孔尚任《曲阜乾隆志》《节序同风录》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县市区编纂的新志,都辑录了一些谚语,有的作为方言志的史料出现,更多的则是专列章节,具有当地言语的典型性和鲜明特色,也可见山东谚语的分布、交叉、重合等具体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谚语卷相互映衬。李万鹏、张延兴、罗福腾编纂的《中国谚语集成·山东卷》历时近30载、近600人参加的、在100多本县市区谚语集成基础上成书,录入谚语23000余条,但是遗憾的是注释太少,方言不明,当前来看所承载的地方文化信息含量偏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重点项目之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要求在方言土语等方面坚持地域性、代表性,尽量保持地方特色并符合民俗学、语言学意义上的科学性。目前,《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谚语·山东卷(一)(二)(三)》卷本的编纂,是学术要求最高的一次民间文学搜集、普查、记录、整理、编纂、出版工程。三卷共收录近15000条谚语,几乎每条有必要解释的谚语都做了较为详尽的附记和注释,共计近240万字、图片近700幅。以期通过本次编纂出版工作,能够尽可能完成对农耕时代山东民间谚语的最大范围的精选辑录,更为要紧的是借此机会通过附记、注释、附录保留下当地方言、民俗、民间话语、民众解释等具有研究价值的文化信息。

(作者系烟台科技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委会出版委员会“俗语”组副组长,《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谚语·山东卷》主编)

# 箕引裘随 炉火纯青

——评田连元《隋唐演义》艺术特色

□耿柳

我这个阵叫陷阵,结果我这陷阵是一吭都没吭。”“潜音梗”直接、现成、巧妙。书中说到李元霸见皇上,他傻乎乎记不住“陛下”二字,柴绍告诉他,“你就记,鼻子底下——陛下。”这傻小子见了杨广,“我管他叫什么?啊……嘿嘿嘿,诶,我说,哪呀!”他想起鼻子底下是嘴来了!让人忍俊不禁。另外秦琼在沿海登州酒楼上碰到吹牛的哥儿俩,“一个牛见愁,为什么叫牛见愁啊?吹牛有本事,牛看见他都害怕;那个姓崔,叫崔粗腿儿,专门能说大话。”这哥儿俩一家出殡,一家娶媳妇的对话,整个就是一段单口相声。这些包袱的设计,符合人物性格,符合书情书理,让人开怀大笑。

千人千面,引经据典。书中的主要人物几十人,每位出场的“开脸”都各具特色,人物性格拿捏到位,善于声音化装,侯君集的高小音儿、罗士信的鸟歌、程咬金的粗犷,苏州王沈法兴的江浙口音,包括女性角色的温婉,都惟妙惟肖。打斗场面的描述,语言干净利落,马上战将落马而亡的描述在其他作品中多有雷同,在这部《隋唐演义》中,几十位战将的死,都各有不同,这是很难做到的。田先生在叙事中,还插入一些知识典故。比如书中说秦琼被称作“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田先生解释:“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田先生解释:“这彭祖,据说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人,彭祖寿活八百岁。”再如“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来历,秦琼“染面涂须诈登州”的路上,有一个“两肋庄”,田先生说:“秦叔宝就在两肋庄那个地方,他走了岔道了。本应该到那边儿去办案,他结果到登州去投案去了,这是为朋友讲义气的一个行动。到后来传来传去,把这个两肋庄就简化了,说秦叔宝为朋友两肋岔道。再传来传去就传讹了,说秦叔宝为朋友两肋插刀,为朋友两肋插刀干吗呀?就是动

刑的话,也没有听说在肋条上插两把刀的。其实就是两肋庄走岔道,给传讹了。”这种跳出情节外的“评”,足见演员的功力。再如,柳树为什么叫垂杨柳?田先生在书中说:“杨广说这个柳树好啊,这个柳树一垂,拿风一吹,很像女人的头发在那儿披散着……告诉手下人,就在河的两岸一律给我栽上垂柳。当时栽种柳树的人发了一笔小财,很多人给这个柳树起了个名字叫杨柳,就是杨广喜欢的这种柳树。要不后来为什么一说垂杨柳呢?它不是杨树,为什么加一杨字呢?它不是杨树的杨,而是杨广的杨。”这些典故,用语不多,画龙点睛。

善于抒情、表演生动。田连元先生的《隋唐演义》写情丝丝入扣,书中描写的靠山王杨林父子、仇人、对手——好汉秦琼的复杂感情,刻画得极为细致,以至于最后,杨林在跳湖之前仅仅说了普通两句话:“秦琼,孤王今日和你再见的缘分已满。叔宝,好自为之,你我来生再见。”这种看似无缘无故,却又饱含深情的描述,让人潸然泪下。说到姜桓楚和罗艺陈述四十年分别之苦:“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始终没有忘了你,罗艺!我天天在想着你,天天在盼着你呀!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回清泪偷弹,没有见着你的音讯。我盼你,我盼你,我盼你,盼白了我的青丝,盼枯了我的泪眼!仍然没有你的消息。”这一大段道白,极具感染力,闻其声,如见其景。

把一个故事说好,难;把评说有机地结合到故事中,更难;引经据典饶有趣味,难上加难。但是对于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来说,家族中几代人的传承,自己几十年的研究与实践,早已驾轻就熟。隋唐故事流传近200年,经过几代说书家不断润色,加上田连元先生个人的艺术处理,使得本书结构情节合理、人物特色鲜明,语言通俗生动,绘人状物细腻,典故引用恰当,紧张处扣人心弦,轻松处令人莞尔,田连元把这部书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情动人,以奇惊人,以巧引人,以理服人,以趣娱人,感染了千万听众。

(作者系辽宁省曲协副主席,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委会出版工作委员会“民间说唱”组专家)

谚语是民间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与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神话、民间传说、民间谜语、民间俗语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体系,深深扎根于民间文化、民众生活这块肥沃的土地,是民间生存环境、生活风俗、生产习惯、信仰、道德规范和审美风尚的高度概括和形象反映,也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化、民间知识、民间智慧广泛传播与直接传承的重要渠道和形式。谚语还直接生动地反映了地方民俗内容。谚语具有很强的地域文化、民俗文化特征,它既能反映一地之风貌,又有深刻的文化内蕴,切实地反映地域性、民俗性和时代性。它们有认识自然和总结生产经验的谚语,有认识社会和总结社会活动经验的谚语,有总结一般生活经验的谚语。谚语比较真实、全面、客观地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生产斗争、社会实践的智慧和经验,具有深刻的训喻性、训诫性、经验性和哲理性相结合的特征,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于一体,是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谚语原创成分多,文化特征明显,传播影响大,与本地的历史传承有密切关系,是中国民间谚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谚语的传播渠道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口头、文献典籍、专门搜集整理、作家传播、移民传播等多种形式。山东人对于谚语的编纂和研究也是很突出的,这也成为山东谚语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

## 山东谚语的历史文化渊源

山东省位于黄河下游,东临渤海、黄海,有山有水有平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一带气候十分温润,林木茂盛,雨量充足,土地肥沃,地形和生物种群多样。特别是泰、沂山区森林茂密的山地和丘陵,食物丰富,便于人类巢居穴处,避免水患、躲避猛兽的侵袭。为古人类采集、狩猎和进一步发展农、牧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沂源猿人化石证明,早在四五十万年前,这里就是古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摇篮。山东境内考古发现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证明,距今至少40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东夷族就实现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乃至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了比较发达的农牧业和手工业。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夷之地被西周封齐,鲁建国,此后的八百多年时间里,鲁、齐先后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并且互相融合成为一个文化实体,以其丰富的内容、完整的体系、极大的包容性、适时的先进性、强大的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较集中地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

齐鲁大地历史悠久,人文遗产丰富,民间的习俗犹有古风遗存,培养着一代又一代粗犷豪放、质朴醇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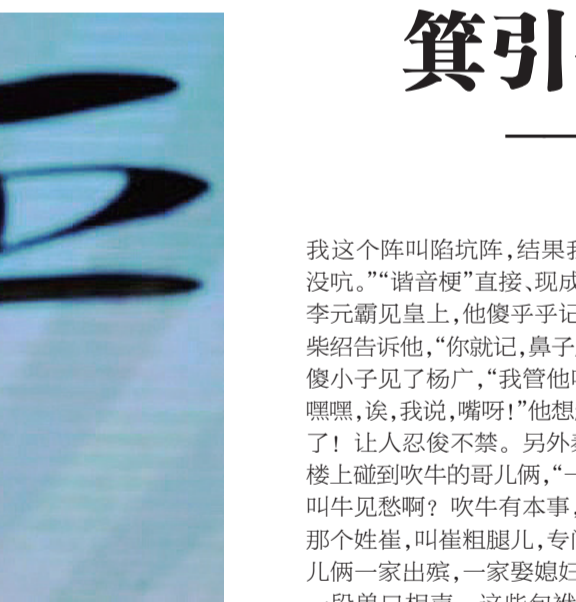
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

近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隋唐演义分卷(一、二)》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全书230回,150余万字,填补了田连元先生长篇大书《隋唐演义》没有文字版本的空白。

田连元先生原名田长庚,其祖父田锡贵是著名沧州木板书艺人,其父田庆瑞是著名西河大鼓艺人。1950年,9岁的田连元在天津拜王起胜为师,王起胜的父亲王文海为其起了艺名“连元”,意为“连中三元”。天津说书艺人刘起林擅说《大隋唐》(即《隋唐演义》),尤其把好汉秦琼塑造得栩栩如生,有“活秦琼”之誉。1956年,刘起林把自己的“书梁子”交给了15岁的田连元。田连元博采众家之长,很快掌握了《大隋唐》的说表本领,1959年,在天津杨柳青某茶社说此书,大获成功。1960年,田连元初到本溪,矿区有个彩屯茶社,由于路远,不通公交车,晚场没人愿去。田连元请缨前往,一部《大隋唐》,天天客满。

这部《大隋唐》,经过田连元多年演出,不断推敲,在20世纪90年代电台录音时已经炉火纯青,其主要艺术特色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考证详细、情节合理。田连元十分注重情节的合理性。如说到“四平山之战”,田先生说:“史上有没有这个四平山呢?现在好像从地图上查找不到。那么隋唐演义里这个原说文在四明山,四明山倒是有这个山,但是这个山在浙江,就是杨广在运河里边儿坐龙舟



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

下扬州怎么走他也走不到四明山去,所以说这个四平山可能当时是一个不大起眼的一个小山,但是这个位置很重要。”再比如:“染面涂须诈登州”一段书,田先生说:“其实在隋朝的时候,登州这个地方呀,还不叫登州,隋朝登州就是牟平县一带,整个那个地带呢,叫东莱郡,包括济南府,也不叫济南府,叫齐郡。到唐朝的时候,这沿海才有登州。可是人们习惯于称呼登州,称呼济南,所以我们在书里边儿呢,就沿用了这个地名,也叫登州。”如“秦琼卖马”一段书,其他版本是说单雄信大哥单达被李渊误杀,单雄信在发送大哥时,买了秦琼的马。田本是单雄信在买了秦琼的马之后,王伯当到单府与单雄信理论,众人说明情况四处寻找秦琼之际,闻听单达死讯。家有丧事时,一般是没有心情买宝马的,田本的情节就设计得更符合情理。

民间性强,诙谐幽默。田本的《隋唐演义》语言生动俏皮,歇后语运用恰如其分,如:“洗脸盆扎猛子——不知道深浅,天亮了下雪——明二白,元宝出汗——财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砂锅子捣蒜——一锤子买卖”等,俏皮话儿十分丰富。一些情节里精心设计了包袱,如“九战文通”一段书,阻挡关帅魏文通追赶秦琼,第一伙人用柴火挡住去路,魏文通一问挑柴火的,是个哑巴,半天问不出个理儿来;第二伙人用棺材挡住去路,魏文通一问抬棺材的,是个磕巴:“我,我我,我我我凭,凭,凭啊,凭啥?给,给你闪闪闪闪闪闪?”情节妙趣横生。再如:“黑如黑一